

## 创作谈

## 我的投稿生涯

陈占敏

1971年我19岁,当上了村里的小学民办教师。星期天去公社开会,会上发下来的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(县文化馆当时的名字)油印的《工农兵演唱》,上面有大鼓书、山东快书、小剧本等,当时我就想,这些我也能写。于是,我就动笔了,写完了抄好,寄往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,我的投稿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其后收到过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寄来的一封信,鼓励我。第二年春天,我突然接到一纸通知,要我到县里参加全县文化工作会议。那一纸通知在我们村引起的轰动,比我后来出版一部长篇小说还要大得多。我们那个小村子,还从来没有人去参加过这种会议。

县里的五天文化工作会议开完,我又被留下来参加县文化馆(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恢复了原名)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,为期一个月。学习班结束后,我在学习班上写的独幕戏曲剧本《支农新曲》,由县文化馆搞音乐的乐手配了吕剧曲谱,油印出来下发到全县。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被“发表”,虽然是油印,没有正式刊号、书号,但对我而言却是莫大的鼓舞。这个小剧本,由联中师生组织排演,冬天参加了全公社中学生汇演。又过了一年,我写的两个独幕戏曲剧本《根深苗壮》《出车之前》由公社组织排演,参加全县群众文艺创作会演获了奖,春节期间在全公社巡演。这是我写作最初的“高光”时期。

然而,我并没有沿着这条戏剧创作之路继续走下去。我的写作形式很快发生了变化,不再写剧本,而写散文了。我的散文《红石峰随笔》在1974年9月24日的《大众日报》上发表。又过了十年,我开始写小说了,由此进入了艰难的大规模投稿时期。

难以道尽几十年的投稿生涯中有多少辛酸、多少曲折、多少磨难。石沉大海自是寻常,最常见的是稿子原样退回,夹一张打印好的千篇一律好像客气却无情的退稿信,能收到一封编辑署名的亲笔信那是稀罕事。也有的编辑在回信中把稿子说得一文不值,用语刻薄,令我羞愧不已。当然也有鼓励,但这样好心的编辑亲笔信很少。三十几年过后,近年来我把那时候被退回的中短篇小说再投出去,发表以后,竟有素不相识的文艺界朋友打听到我的通信方式,打电话告诉我,他们把我的小说发到了微信群里讨论,文友们说我的小说有新东西。我写于三十多年前的小说,现在发表出来,居然被文友说成是新东西,看来文学的“新”与“旧”并不完全由时间来界定。

我的投稿生涯中也有难得的幸运,让我铭记于心。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沉钟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于“小说界文库”出版以后,我就主要写长篇小说了。沉潜八年完成的“黄金四书”《悬挂的魂灵》《金童话》《金老虎》《倒计》,定稿打印出来后,我一并寄给了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张海珊。没有像以往那样久久等待,两个月后,山东文艺出版社即邀我去济南签合同。那时候,这四部长篇小说

张海珊只看完了三部,有一部还未看,便作出了总体判断。时任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路英勇毫不怀疑地相信了张海珊的眼光,跟我签订了出版合同。一起吃饭时,出版社的一位朋友说,稿子能让张海珊看中,可不容易。我笑了笑,深感幸运:我的稿子被分到了张海珊手里。

我的投稿生涯随着“黄金四书”,好像也进入了“黄金时期”。2008年5月上旬,我把“黄金四书”第二部《金童话》的电子版发给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主编林建法,那时林建法先生还兼任《西部·华语文学》主编。稿子发出去仅一周,林建法先生就打了电话,说他在车上给我打的电话,《金童话》他只看了一半,决定第7期发表,让我把照片和个人简介发过去。《西部·华语文学》第7期几乎用整整一期全文发表了《金童话》,封面发了我的照片。一个月后,山东文艺出版社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杂志、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在万松浦书院联合举行“黄金四书”先期问世的《悬挂的魂灵》《金童话》研讨会,由林建法先生主持。嗣后,林建法先生又在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上编发了“陈占敏评论专辑”,发表了根据张炜、张清华、宋炳辉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文章。

过了“黄金时期”后,我的投稿又进入了新的低谷,往往是编辑看中了稿子,十分赞赏,却被负责发行的否决了。决定一部书稿命运的不是文学质量、不是编辑,而是市场效益、是发行。编辑每每向我感叹,如果倒退几年,绝对没有问题。文学、出版,受制于市场、受制于发行,难道只是投稿者的困境,不是文学、出版的困顿吗?这令我想起了1996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沉钟》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,责编之一、已故老编辑张森曾对我说,他们出版社出长篇,只看质量,不问市场,挣钱的有他们出版社办的《故事会》杂志。因此,我这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部长篇小说,就得以列入“小说界文库”出版。张森先生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这个消息,还说他们要开一个《沉钟》讨论会,约我再写一部长篇,这便是《红晕》了。

随着出版形势的变化,我的投稿生涯再度陷入困境,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幸运降临。我的“乡思三部曲”《大水》《棉花树》《残荷》改定后,跟时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联系,吴义勤先生安排编辑田小爽跟我对接。稿子发去后,“乡思三部曲”整体一并推出。吴义勤和田小爽从未跟我谈市场问题、发行问题,在他们那里,仿佛除了作品的质量,一切都不成问题。然而市场摆在那里,还是能够看得到。“乡思三部曲”参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,需报送作品。出版社已无存货。我到网上买书,网上的价格竟翻了两三倍,有的二手书的价格也是如此。而且出现了盗版,跟卖家联系,卖家问我要多少,要多少他们马上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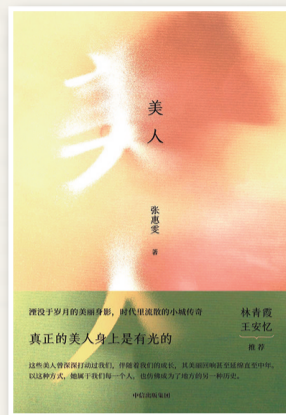
感谢上苍,我大病后改定的“乡思三部曲”出版、发行竟然遇上了这

样的幸运。“乡思三部曲”没有开讨论会,没有热捧,我这部生命之作,竟然与我的肉体生命同样得到了天意眷顾。2012年我刚刚办理退休手续一周,查出了癌症,立即手术。因为是癌症晚期了,主刀大夫断定我活不过三个月。按照医生的说法,我不可能完成“乡思三部曲”的修改,也看不到它的出版了。而我体检前开始翻译的哈代的长篇小说《德伯家的苔丝》已经译了一半,也肯定译不完了。这让我怎能甘心!还是感谢天意的眷顾,我活过了三个月,活过了三年,活过了十多年。我不仅看到了“乡思三部曲”出版面世,还翻译完了《德伯家的苔丝》,接下来又翻译了哈代的另外五部长篇小说《还乡》《无名的裘德》《卡斯特桥市长》《远离尘嚣》《林地居民》。

我翻译的哈代的长篇小说,没有遇到出版困难。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《还乡》相继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,接着,长江文艺出版社又重版了这两本书,随后出版了《无名的裘德》。当我翻译完《卡斯特桥市长》《远离尘嚣》,又将《林地居民》翻译了将近一半的时候,在万松浦书院参加一次文学活动时,与时任山东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王路先生相遇。吃饭时,随意谈起哈代小说的翻译,王路先生当即说,我翻译的这套哈代的长篇小说集由他来做。第二天活动结束后,王路先生连夜返回济南。翌日下午,即来信跟我谈版权,安排编辑室主任与我联系,要走了稿子。这是我的稿子少有的不需要投出去等待,而是被“要”去的。我想,王路先生如此热情、如此高效率地作出决定和安排,没有考虑市场,不需要发行来说话,他是认定了这是迄今卷数最多且由一个人翻译的《哈代长篇小说集》,哈代这位狄更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,最重要的六部长篇小说亦即“性格与环境小说”全部包括在内,他看重的是哈代小说在汉语翻译史上的出版价值和意义,他是用出版家的眼光和胸怀来看待并决定的。

我年过古稀,自往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投稿算起,我的投稿生涯已经过去了五十三年;从第一篇散文在《大众日报》正式发表算起,发表作品将满五十年。我的大半生命,是在写稿投稿中度过的。谁知道我的大病与写稿投稿有没有关系呢?不过,我深深地知道,我的生命献给了文学,我的生命也得益于文学。我查出绝症做手术之后,在化疗、一次次住院治疗、中药调理恢复期间,始终没有丢下手中的这支笔。我把哈代的六部长篇小说全部译完,又写了已出版的《李白的选择》和待出版的几部书以及一些散文随笔文论,还写了许多旧体诗,用这种旧体诗形式记录下我获得新生后的心路历程、复杂的心曲。我铺开面前的稿纸,放眼远方的目标,心无旁骛,忘记了绝症的威胁,我的生命居然顽强地延续下来。将新写的稿子一篇篇投出去,念及这样的投稿生涯,令我感怀不已……投稿,好!

## 新书架



书名:美人  
作者:张惠雯  
出版单位:中信出版集团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,“我”的故乡有三个出名的美人:何丽、丽娜、红霞。她们生而美丽,却并未因此获得命运的偏爱;她们给小城带来了美的启蒙与青春怀念,也招致人们的好奇窥探、流言蜚语……

《美人》以中国北方小城美人的传奇人生、系列故事,折射自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的历史巨变,追溯一代中国女性的独特成长历程及生命经验。



书名:葡萄酒:一部微醺文化史  
作者:[美]约翰·瓦里亚诺  
出版单位:文汇出版社

本书从葡萄酒的起源说起,按时间顺序讲述了从古希腊、罗马、中世纪、文艺复兴时期、17和18世纪到现代的葡萄酒文化史,探讨了不同时期葡萄酒与宗教、神话、文学、艺术、医学、养生等的关系,以及与当代流行文化的勾连,同时涉及人的情感生活、性、死亡、人际交往、节庆活动以及成为社会问题的酗酒现象。

本书堪称对西方古往今来葡萄酒文化的全景式介绍,它带领读者经历了一次愉快的葡萄酒历史之旅。



书名:走进酒吧的年轻女性  
作者:黄燕华  
出版单位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年轻女性为什么会去酒吧?她们在酒吧中有怎样的实践、体验与感受?当我们将酒吧视为一个“压缩现代性”的实验室,年轻女性在其中的实践与反思,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当代中国的性别、阶层与道德变迁的窗口。